

# 制藝的結尾：

## 湯顯祖萬曆癸未會試制藝考論\*

胡梓穎\*\*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 摘 要

過往論者普遍相信，湯顯祖 (1550-1616) 於萬曆癸未 (1583) 科撰寫的會試制藝，僅一篇傳世。在會試墨卷見缺的情況下，部分論者就目前學界對湯顯祖制藝風格的印象，聯想到湯氏五應會試才以低名次賜同進士出身，或與其制藝思想、風格有乖正統有關。本文嘗試從明清各種制藝選本，追溯湯顯祖會試制藝的下落，以揭示其癸未科墨卷之原貌。透過對比湯氏會試制藝的各種版本，本文指出明、清兩代選本的文字不盡相同。清代選本的編者，往往把湯氏原文的「大結」刪短為「收結」，以迎合清代制藝的寫作規範。制藝結尾的刪節，不僅削弱湯文的結構美，同時隱沒其文的思想內涵。墨卷結尾被重新發現，揭櫫湯顯祖的會試制藝不僅在內容和形式上均符合考試規範，還包含著抒情與反諷。

**關鍵詞：**湯顯祖，會試，制藝，結尾，萬曆

---

\* 拙文獲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洽蕙短期進修研究贊助金」的資助，謹此致謝。在論文撰寫期間，承蒙業師華瑋教授悉心指教，學友李慧博士、李穎瑜博士、陶冉博士的指正，以及研究助理李凡一先生的細心校對，特此感謝。另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專家的細心審閱，不吝惠賜寶貴意見，以補正拙文未盡善處，謹致謝忱。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gtwwu@eduhk.hk

## 一、前言

湯顯祖 (1550-1616) 是有明一代重要的制藝家及戲曲家。惟過往有關湯氏作品的研究，大多著眼於其戲曲方面的貢獻。1983 年，徐朔方 (1923-2007) 在總結湯顯祖的文學成就時指出，除了戲曲，湯顯祖亦擅於古文和詩賦創作，並強調他的古文、詩賦都與科舉息息相關。<sup>1</sup> 長年累月的制藝書寫訓練，無疑影響及湯顯祖的思考和書寫習慣。這些習慣又在不知不覺間流露於湯氏的作品之中，貫串著其各體文學的創作。耐人尋味的是，徐氏始終未論及湯顯祖的制藝。

直到 1995 年，徐朔方著手重編《湯顯祖全集》，<sup>2</sup> 增設卷五十「制藝」，錄入晚明陳名夏 (1604-1654)《湯海若先生制義》收錄的全部制藝作品，<sup>3</sup> 計五十五篇，<sup>4</sup> 皆是湯氏平日練習之作。至於卷五十一「補遺」，則補入五篇制藝，分別題為〈次九曰嚮用五福〉、〈我未見好〉、〈故君子可……其道〉、〈孔子有見〉及〈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sup>5</sup> 其中〈次九曰嚮用五福〉、〈我未見好〉為湯氏隆慶四年庚午 (1570) 江西鄉試墨卷，而〈孔子有見〉則是萬曆十一年癸未 (1583) 會試墨卷。另「補遺」中又誤把湯顯祖三篇應試墨卷列為「制藝」，分別題為〈策第三問〉、<sup>6</sup> 〈天下之政出於一〉及〈擬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銘凱還羣臣賀表〉。<sup>7</sup> 至於湯氏其餘各篇鄉試、會試墨卷，當時依然下落不明。徐朔方在

<sup>1</sup> 徐朔方，《論湯顯祖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11-12。

<sup>2</sup> 湯顯祖的全集早於 1962 年面世，由徐朔方、錢南揚分別整理詩文、戲曲兩部分，題《湯顯祖集》，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集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部〈出版說明〉，頁 2。

<sup>3</sup> 湯顯祖，《湯海若先生制義》，收入陳名夏編，《國朝大家制義》第 26 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末陳氏石雲居刻本）。

<sup>4</sup> 湯顯祖，《湯顯祖集全編》，卷 50，頁 2043-2134。

<sup>5</sup> 同前引，卷 51，頁 2192-2214。

<sup>6</sup> 〈策第三問〉原收錄於《隆慶四年江西鄉試錄》，是湯顯祖參加鄉試第三場的鄉墨，類屬「策論」而非制藝。此篇策論名列該屆第一。見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隆慶四年江西鄉試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第 29 函第 3 冊（寧波：寧波出版社，2010，天一閣藏明刊本），頁 87a-95b。

<sup>7</sup> 另據《皇明貢舉考》所載，〈天下之政出於一〉、〈擬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銘凱還羣臣賀表〉二篇，都是萬曆癸未會試第二場的試題，雖然皆是湯顯祖當年的考卷，但其體裁分別為「論」和「詔誥表」，並非制藝。張朝瑞，《皇明貢舉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8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9，頁 537。

〈編集緣起〉中，總括了他對湯顯祖制藝的看法：

《湯海若先生制藝》一書，當時未見。書中都是八股文，萬曆十年作于杭州。評批者所指的應予汰除的「禪學中語」以及其它一些「疵謬」，都可以看出湯氏偏離正統的八股文格範，但仍被後人列為舉業八大家之一。雖然八股文說不上是文學作品，在全集中應增列一卷。<sup>8</sup>

徐氏沒有將制藝納入文學的藩籬，說明了他從未論及湯氏制藝的原因。在徐氏的總括中，有三點值得留意。首先，他初步斷定《湯海若先生制義》收錄的制藝作品皆作於萬曆十年壬午。其觀點是依據湯顯祖〈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的記述：「庚、壬二午間，制義不能盈十。比杭守貳監利姜公奇方迫予明聖湖頭，令作藝。已近臘月而逾春，卒卒成一第去。」<sup>9</sup> 湯顯祖於隆慶四年庚午高中江西鄉試，並於萬曆十一年癸未獲賜同進士出身。湯氏自言從鄉試及第至萬曆十年壬午期間，創作的制藝不到十篇。後來在其友人姜奇方（1536-?）的督促下，湯顯祖才在應癸未科會試之前，於杭州努力撰寫制藝備試。徐氏的觀點，假定湯顯祖在進士及第後沒有再從事制藝創作。其次，徐朔方依據陳書所錄的多家評論，指出湯顯祖的制藝偏離八股功令，同時有援釋入儒的傾向。《湯海若先生制義》被重新發現，一方面揭開了湯顯祖制藝的神祕面紗，另一方面又讓研究者產生疑問，聯想到湯顯祖以低名次的賜同進士身分通過殿試，應與其制藝偏離儒家正統思想和八股主流風格有關。<sup>10</sup> 其三，徐氏雖然不把制藝視為文學，卻認為制藝對湯顯祖研究別具價值。徐朔方的總括在往後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成了學界普遍的共識。他提出這些觀點時，研究湯氏制藝之風未開，加上文獻的缺乏，觀察與實際情況有些微落差自是難免。惟徐氏將湯顯祖制藝作品收錄於《湯顯祖全集》中，把其制藝引入研究者的視野，確是獨具慧眼。

踏入二十一世紀初，由於研究風氣的轉變，研究者開始就《湯顯祖全集》所收錄的數十篇制藝進行研究，並陸續發表有關湯顯祖制藝的研究成果。<sup>11</sup> 隨著各種

<sup>8</sup> 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頁 13-14。

<sup>9</sup> 湯顯祖，《湯許二會元制義》（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刻本），頁 1b。

<sup>10</sup> 鄒元江、龔重謨都曾經指出，雖然無法看到湯氏的會試試卷，但相信湯氏以低名次進士及第，除了因為兩度婉拒張居正（1525-1582）的招攬，亦與其制藝行文重性靈、不囿於八股功令有關。見鄒元江，《湯顯祖新論》（臺北：國家出版社，2005），頁 99；龔重謨，《湯顯祖大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 79-80。

<sup>11</sup> 相關研究計有：魏青，〈湯顯祖和八股文〉，《溫州師範學院學報》，1（溫州：2001），頁 32-

八股文史的編撰、面世，湯顯祖在制藝史上的地位亦愈見清晰。龔篤清的《明代八股文史探》、孔慶茂的《八股文史》，都以專門章節討論湯氏的制藝。<sup>12</sup> 其中《明代八股文史探》所引錄的湯顯祖童試考卷〈女有餘布〉，<sup>13</sup> 並未見錄於《湯顯祖全集》。

其後部分研究者，開始關注湯顯祖的應試制藝，研究方向主要有二：其一是對龔重謨、龔篤清引錄的應試制藝進行分析。鄒元江曾引湯氏之鄉試制藝〈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文，從哲學角度指出其作屢有創見。<sup>14</sup> 鄧俊、高琦則依據龔篤清引錄的〈女有餘布〉進行分析。<sup>15</sup> 後來美國學者戴沙迪 (Alexander Des Forges) 再次依據龔氏引錄的〈女有餘布〉，指出湯文超出了《孟子》經文的原意，從經濟、道德雙線分析明代紡織業的情況，提倡文人和織女都可以透過售物介入市場交換，以臻修身齊家之境。<sup>16</sup> 其二是對佚失的湯氏制藝進行版本研究。拙文〈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湯顯祖嘉隆時期應試制藝研究〉率先考究湯顯祖於明嘉靖、隆慶時期應試制藝的版本，針對湯氏童試考卷〈女有餘布〉、鄉試墨卷〈我未見好仁者〉及〈次九曰嚮用五福〉，透過對照海內外新發現的幾種版本，指出明、清兩代選集選錄的湯顯祖應試制藝，版本差異明顯。<sup>17</sup> 其後饒芳、劉昌衍依據明代歷屆會試錄，列出湯氏會試墨卷的題目，表示由於《萬曆十一年癸未科會試錄》已佚，<sup>18</sup>

35；胡慧錦，〈湯顯祖的制藝觀〉，《文藝生活·文海藝苑》，9（長沙：2014），頁 13；姚越超，〈論八股文對湯顯祖戲曲創作的影響〉，《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重慶：2014），頁 95-98；王小巖，〈論湯顯祖的制藝〉，《人文論叢》，2（武漢：2015），頁 185-199；高琦，〈代言盡意·擇理精淳——論湯顯祖的八股文創作〉，收入徐國華主編，《湯顯祖研究集刊——紀念湯顯祖逝世 400 周年專號》（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6），頁 41-53；王玉超，〈湯顯祖的制義文寫作與早年文學追求〉，《文學評論》，6（北京：2018），頁 202-210。

<sup>12</sup> 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 435-445；孔慶茂，《八股文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139-154。

<sup>13</sup> 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頁 438-439。

<sup>14</sup> 鄒元江，《湯顯祖新論》，頁 68-71。

<sup>15</sup> 鄧俊、高琦，〈少年顯奇才，佳構驚考官——初論湯顯祖早期八股文《女有餘布》〉，《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2（撫州：2012），頁 105-108。可惜龔氏在著述中並未清楚交代〈女有餘布〉的版本來源；而鄧、高二人的論文亦未考查該文原始出處或進行校對。

<sup>16</sup> Alexander Des Forges, "Industry and Its Motivations: Reading Tang Xianzu's Examinatio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Excess Clot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0.1 (2020), pp. 85-122.

<sup>17</sup> 胡梓穎，〈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湯顯祖嘉隆時期應試制藝研究〉，收入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編，《湯顯祖學刊》第 8-9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頁 129。

<sup>18</sup> 雖然官方的會試錄已佚，但筆者發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今仍藏有《萬曆十一年癸未科會試錄》明萬曆十一年之抄本。該抄本並非官方刊印，故書中體例與官方規範略有不同，內容主要記錄當年進士及第者的資料。《萬曆十一年癸未科會試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

不可能再現當年程文的詳細情況，並依據《湯顯祖全集》所錄，指出目前可考的會試制藝計有三篇。<sup>19</sup> 惟當筆者據此進一步考查，發現問題有二。其一，正如前文所述，《湯顯祖全集》引錄的三篇湯氏會試墨卷，僅〈孔子有見〉一篇類屬制藝。<sup>20</sup> 其二，根據張朝瑞 (1536-1608)《皇明貢舉考》所載，萬曆癸未會試第一場的三篇「四書義」題目依次為〈子曰吾之於人也……行也〉（下稱〈吾之於人〉全章）、<sup>21</sup> 〈脩身則道立……天下畏之〉（下稱〈脩身則道〉一節）及〈孔子有見行可……養之仕〉（下稱〈孔子有見〉三句），<sup>22</sup> 而湯顯祖當年所撰的三篇制藝，目前皆有多種版本傳世（原文詳見附錄）。

湯顯祖研究乃文學史領域的顯學。即使是湯氏留下來的片言隻語，對研究者來說都具有一定價值，更何況是影響及其下半生的會試制藝。在湯顯祖會試制藝見缺的情況下，過往論者只能透過傳世的數十篇湯氏制藝的總體風格，推測湯顯祖的會試表現。印象式的推測，加上對湯顯祖制藝的傳世情況缺乏全面了解，不僅有礙研究者對湯顯祖制藝風格的判斷，亦讓學界難以在制藝發展史上給湯顯祖作出正確定位。職是之故，本文將首先探討制藝體式在明清時期發展的過程中，其結尾在書寫規例上的轉變。繼而考證新發現的三篇湯顯祖萬曆癸未會試制藝的各種版本，以廓清其應試制藝的原貌。然後，將圍繞上述會試制藝的不同版本，闡明散落的湯氏制藝作品得以保存的背景因素、明清制藝選集的編選動機和傾向，以及當時讀者的閱讀意圖，對辨識湯顯祖制藝版本之差異、作品的原貌，以及了解其制藝風格的轉變，都具有一定意義。最後，本文將進一步勘察湯氏應試制藝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構思，並重新審視其制藝是否偏離正統的格範。

---

(1583) 抄本)。

<sup>19</sup> 饒芳、劉昌衍，〈湯顯祖科考試卷佚存略考〉，收入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編，《湯顯祖學刊》第 8-9 輯，頁 175-179。

<sup>20</sup> 筆者認為〈策第三問〉、〈天下之政出於一〉、〈擬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銘凱還群臣賀表〉三篇皆非類屬制藝。原因詳見註 6 及 7。

<sup>21</sup> 翻查各種文獻資料，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及鶴成久章所引錄周鍾《皇明程墨紀年四科鄉會程墨紀年》，均作「吾之於人」，只有湯賓尹 (1568-?)《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書作「吾之于人」。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論語集注》，卷 8，〈衛靈公第十五〉，頁 166；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 9，頁 536；鶴成久章，《明代八股文學史資料の整理と研究》（東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7），頁 49；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坊刻本），頁 101a。由於官方文獻均作「於」，因此本文將所有詞條統一為「吾之於人」。

<sup>22</sup>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 9，頁 536。

## 二、明清制藝體式的規範及其結尾的演變

明末以降，制藝長期被批評為體式僵化的應試文體；而所謂「僵化」，正說明制藝的體式在當時的發展已臻成熟。制藝的結構可分為三大部分：開端（破題、承題、入題）、正文（起講、股對、出題）和結尾（收題）。制藝發展至明成化（1465-1487）時期，由王鏊（1450-1524）集大成的「八股」結構漸漸成為主流形式，被時人視為「正格」、「正體」、「時文正宗」。<sup>23</sup> 湯顯祖曾言：「予弱冠舉於鄉，頗引先正錢、王之法，自異其伍。」<sup>24</sup> 可見他少時習八股文，亦視王鏊、錢福（1461-1504）的風格為宗。艾爾曼把八股文體翻譯為英語時，選擇將之譯作「八股格」(eight-legged grid) 而非「八股體」(eight-legged genre)，其理據在於，士子完成制藝考卷的草稿後，文章都是抄寫在方格紙上，以便考官評審。若作品的字數過多或過少、股對不平衡、又或出現缺字等問題，方格紙上便一目了然。<sup>25</sup> 譬如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所錄湯顯祖的會試制藝〈吾之於人〉，就有缺字情況。<sup>26</sup> 明清制藝選本的編者，一般都會將這些缺字或股對失衡的情況加以修正，務求展示完美的範文。因此，若選本中保留著缺字或股對不平衡的情況，其所呈現的很可能是作品原貌。

制藝雖然被俗稱為「八股」，但正如方苞（1668-1749）所言「明人制義，體凡屢變」，<sup>27</sup> 其體式並非一成不變。明嘉靖以後的制藝，正文部分不少都只有六

<sup>23</sup> 制藝「八股」的體式，固然有其發展的歷程，惟中外研究者大都認為王鏊是八股格的集大成者。持此論者包括華裔學者商衍鑾、孔慶茂、龔篤清，美籍學者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孫康宜、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日籍學者鶴成久章等。參見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267；孔慶茂，《八股文史》，頁 85；龔篤清，《中國八股文史·明代卷》（長沙：嶽麓書社，2017），頁 325；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388;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13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 鶴成久章，《明代八股文學史資料の整理と研究》，頁 5。

<sup>24</sup> 湯顯祖，《湯許二會元制義》，〈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頁 1a。

<sup>25</sup>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94-395. 有關墨卷以方格紙謄寫的情況，可參閱馮家紅，《耕讀為本：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藏品圖錄》（合肥：安徽美圖出版社，2018），頁 16-39。

<sup>26</sup> 參見附錄〈吾之於人〉全章「登纂順之民」句。

<sup>27</sup> 方苞等編，《欽定四書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1742）刻、清道光補刻本），卷首，

股，亦有部分立兩扇格。<sup>28</sup> 此時文人漸次意識到「八股」體式的僵化，紛紛開始進行文體改革。這股改革風潮，起於嘉靖時期，盛於萬曆時期，至崇禎時期仍未止息。明代「舉業八大家」的出現，反映制藝文體及其風格亦有演變之歷程。最早提出「舉業八大家」的是明人孫岱（生卒年不詳）。<sup>29</sup> 他在《歸震川先生年譜》中就列出了七位與歸有光（1507-1571）齊名的制藝名家：

舉子業與德清胡斯泉友信、歸善楊文襄起元、臨川湯義仍顯祖，先後齊名，以配同郡王文恪公鏊、武進唐文襄公順之、薛方山應旂、常熟瞿文懿公景淳，此所謂八大家也。<sup>30</sup>

文中指出，歸有光與胡友信（1516-1572）、楊起元（1547-1599）、湯顯祖先後齊名。孫岱與歸有光乃同時人，而文中孫氏僅尊稱王鏊、唐順之（1507-1560）、瞿景淳（1507-1569）為「公」，而其餘各人均以常稱，可以推想孫岱羅列八大家之時，薛應旂（1500-1574）、胡友信、楊起元、湯顯祖四家均仍在世。歸有光卒於隆慶五年（1571），而湯顯祖則於隆慶四年以弱冠之齡通過鄉試。歸有光是繼王鏊之後最負盛名的制藝名家，亦是唐宋派的文宗，其影響力甚至下及清代桐城派。湯顯祖較歸氏晚生四十餘年，竟能以弱冠之齡與歸有光齊名，可見湯顯祖當時文名之重，亦無怪乎他被張居正招攬。<sup>31</sup> 湯顯祖的門生陳際泰（1573-1640）在總括明代制藝的發展時指出：「近來欲刻十進士，斷自湯義人〔仍〕先生而止。……夫文之妙，至義人〔仍〕先生而止。」<sup>32</sup> 陳氏選錄制藝作品，止於湯顯祖，原因在於他認為湯氏之後文已衰微。值得注意的是，方苞所言「體凡屢變」，固然反映明代制藝的發展形態；但所謂「變」，部分是源於文體發展的變革，部分則是導因於官方考試規則的轉變。由於本文是以湯顯祖的會試制藝為討論對象，因此以下討論主要關涉考試規範的嬗變。

〈凡例〉，頁 1a。

<sup>28</sup>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頁 262-263。

<sup>29</sup> 後來明末清初人趙吉士（1628-1706）在《寄園寄所寄·癩祭寄·類聚數考》中，則將「八大家」依次列為：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旂、歸有光、胡友信、楊起元及湯顯祖。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 7，頁 618。

<sup>30</sup> 孫岱，《歸震川先生年譜》（天津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頁 48 上。

<sup>31</sup>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230，〈湯顯祖傳〉，頁 6015。

<sup>32</sup> 陳際泰，《太乙山房文集》（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1633）繡谷李士奇校刊本），卷 5，〈陳云怡先生近義序〉，頁 14b-15b。

明人制藝篇中最自由的部分，莫過於其結尾（或稱收題）。制藝之收題在明時稱為「大結」，一般在敷衍聖人之言後，作者再以數十字乃至百餘字，於篇末發揮自身的見解，<sup>33</sup> 並收束全文。「大結」的功能有三：其一，為正文「代聖人立言」的總結。其二，作者可以把「代聖人立言」的口吻還原，以出己意。其三，大結的文意和字眼往往與破題、承題呼應。<sup>34</sup> 明代初期，大結可論及本朝事，<sup>35</sup> 以便考官考察士子的政治觸覺。<sup>36</sup> 及至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葉經（1505-1543）主持當年山東鄉試，其中一名考生在其墨卷中寫道：「繼體之君，德非令主」。嘉靖皇帝（朱厚熜，r. 1522-1566）以為此是謗訕他的說話，結果將當年相關的試官與考生施以廷杖八十及削籍，葉經亦因此喪命。<sup>37</sup> 朝廷為免士子藉著制藝大結的書寫自由以譏訕朝政，<sup>38</sup> 又或以此炫才露己，從此制藝大結被嚴禁論及本朝事。直到萬曆中期，大結又被限於敷衍三、四句。<sup>39</sup> 清康熙十六年（1677），朝廷更明確規定「鄉會應試諸生文字內，概不許作大結」，<sup>40</sup> 從此士子嚴禁在文末發表個人見解。「大結」形式被廢除後，取而代之的是精確地概括經旨的「收結」。<sup>41</sup>

制藝「大結」被轉化為「收結」，不僅限制清代士子的書寫自由，同時影響及清代制藝選本收錄明代制藝的傾向。清代選本的編者，往往會因應考試規例的改變，竄改先賢原作的文句乃至結構格式，以迎合當時讀者的考試需求。至於保存前賢佳作的原貌則屬次要目的。這種改本的風氣，始於明萬曆中葉以後，<sup>42</sup> 而在入清後變本加厲。清代制藝選集的編選者，大多依據當時制藝的規格，把選集中明人制藝作品的「大結」刪改為「收結」。故對照明、清制藝選本，往往會發現兩種版

<sup>33</sup>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樂保群校點，《日知錄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卷 16，〈試文格式〉，頁 855。

<sup>34</sup> 鄭邦鎮，《明代前期八股文形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34。

<sup>35</sup>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 16，〈試文格式〉，頁 855。

<sup>36</sup> 藺德生、趙萍，《八股風光五百年》（北京：語文出版社，2011），頁 97。

<sup>37</sup> 談遷，《國榷》（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嘉靖二十二年」，頁 11b-12a。

<sup>38</sup>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頁 262。

<sup>39</sup>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 16，〈試文格式〉，頁 855。

<sup>40</sup> 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80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光緒石印本），卷 332，〈禮部·貢舉·試藝體裁〉，頁 296。

<sup>41</sup> 龔篤清等編著，《八股文話》（長沙：嶽麓書社，2020），龔篤清〈前言〉，頁 5。

<sup>42</sup>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頁 217-218。



本的結尾詳略不同。<sup>43</sup>

本文所論湯顯祖的會試制藝，都是撰寫於萬曆十一年癸未，也就是「大結」篇幅仍可多達百餘字，但已不容涉及本朝事的萬曆初年。由此可以推想，湯顯祖三篇會試制藝都應以「大結」收結，才能符合萬曆初年考試的格式要求。過往論者普遍認為，制藝體式是統治者箝制士子思想的工具，因此制藝作品都是陳腔濫調，缺乏思想內涵。然而，從制藝結尾規範的演變歷程，可知自明代嘉靖時期開始，考生在「大結」中發表意見的空間不斷萎縮。直到清初「大結」被取消，考生的發言自由才完全被剝奪。明、清兩代的朝廷都將「大結」視為洪水猛獸，不斷設限，正說明制藝（至少其大結）往往包含著考生的思想內涵。「大結」既是明代制藝功令中最重要特徵，是故以下對湯顯祖會試制藝的考證和討論，將會盡量聚焦在各篇的「大結」之上。

### 三、湯顯祖萬曆癸未會試制藝版本考

明萬曆十一年癸未 (1583) 春，湯顯祖第五次上京參加會試，以《尚書》為本經。<sup>44</sup> 該屆參加會試的考生計有 4600 人，其中僅有 341 人成功登第。<sup>45</sup> 湯顯祖當年以第 65 名通過會試，<sup>46</sup> 殿試後其名次卻跌至三甲第 211 名（總排名第 281 名），僅能獲賜同進士出身。<sup>47</sup> 按明代科舉的規定，鄉試、會試各分三場舉行：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及「五經」義四道，以制藝體式作答；第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sup>48</sup> 由此可見，明代科舉考試僅第一場要求考生撰寫制藝。雖然該屆官方正式刊刻的《會試錄》已佚，但《皇明貢舉考》仍詳細載錄該屆會試第一場的考試題目。湯顯祖以《書》為本經，因此其撰寫的七篇制藝應依次為：

<sup>43</sup> 胡梓穎，〈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頁 116。

<sup>44</sup> 《萬曆十一年癸未科會試錄》，頁 17。

<sup>45</sup>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 9，頁 537。

<sup>46</sup> 龔延明主編，毛曉陽點校，《萬曆十一年進士登科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下冊（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頁 626。

<sup>47</sup> 李周望輯，《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明萬曆十一年進士題名碑錄〉，頁 32a。

<sup>48</sup> 張廷玉等，《明史》，卷 70，〈選舉二〉，頁 1694。

- 「四書」  
 〈子曰吾之於人也……行也〉  
 〈脩身則道立……天下畏之〉  
 〈孔子有見行可……養之仕〉  
 《書》  
 〈欽哉欽哉……而天下咸服〉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六三德一曰……作威王食〉  
 〈心之憂危……作股肱心膂〉<sup>49</sup>

筆者依據上列題目，追查湯顯祖當年應考之墨卷，發現三篇「四書」義至今仍有多种版本傳世，而四篇《書》經義之墨卷均佚。以下將分述湯氏三篇「四書」義墨卷的版本流傳情況。

#### (一) 〈吾之於人〉全章

此篇制藝未見錄於《湯顯祖全集》。目前傳世的三種版本皆見於明末的制藝選本。其中最早面世的是由湯賓尹所編的《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下稱《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sup>50</sup>《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的特色在於只收錄鄉試及會試第一場的「四書」義考卷，而不收錄「五經」義。書中依次列出每屆鄉試及會試所設的三道考題，各題以下選錄的作品數目不一，大概是以文章質量為篩選標準。譬如湯顯祖癸未年會試所撰的三篇「四書」義，湯賓尹僅收錄了〈吾之於人〉及〈孔子有見〉兩篇，而〈脩身則道〉則未有選錄。

此選本今傳版本有二：其一為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甲寅）年（1614）馮汝宗刊本，其二為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坊刻本。中央研究院所藏的馮汝宗刊本，計十一冊，不分卷，頁首附有睡庵居士之印。首七冊為鄉會

<sup>49</sup>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9，頁536-537。

<sup>50</sup> 是書編者湯賓尹乃萬曆中期機法派的制藝名家，曾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由於官職之顯、文名之隆，湯賓尹所編選的各種制藝選本，幾乎都成為當時的暢銷書。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收入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92。湯賓尹的莫逆湯顯祖亦對其制藝讚譽有加，晚年特意編選《湯許二會元制義》，其中收錄湯賓尹及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科會元許癸（1570-1606）的制藝，作為教授兒子撰寫制藝的範本。湯顯祖，《湯許二會元制義》，〈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頁1a-3b。

墨卷，後四冊為鄉會程文，<sup>51</sup> 選錄作品起自明宣德十年乙卯（1435），迄至明萬曆四十年癸丑。是書卷首附有湯賓尹所撰的〈選歷科墨卷漫書〉，文末題「甲寅夏日睡庵存稿」。<sup>52</sup> 集中所錄篇章皆為考卷原文，各篇均附有側批和總批，乃湯賓尹給文章的修改建議，可惜此本收錄湯顯祖作品的部分有缺頁情況。幸臺北國家圖書館亦藏有《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的明末坊刻本，版本完整。與馮汝宗本對照，明末坊刻本的選篇內容完全相同，但刊刻品質明顯遜於後者。由於明末坊刻本的內容比較完整，因此本文將以該刻本為主要底本。湯賓尹就癸未〈吾之於人〉一題，共收錄了當屆六位進士的篇章，依次為第 1 名李廷機（1542-1616）、第 3 名王堯封（1543-1613）、第 23 名梅鵬祚（1557-?）、第 38 名顧允成（1554-1607）、第 65 名湯顯祖及第 150 名陳其志（1556-?）。各篇均有圈點及側批，文後附有湯賓尹的總評。<sup>53</sup> 湯顯祖之文末段從「噫！夫子慨深，待民厚矣」至「其以維持皇極三德，深乎！」<sup>54</sup> 計有 75 字，符合明萬曆初年制藝的書寫格範。

另據日本學者鶴成久章查證，〈吾之於人〉還見錄於兩種明代制藝選本。其一為周鍾（1613-1645）《皇明程墨紀年四科鄉會程墨紀年》，其二為韓敬《歷科程墨文室十帙》，兩種選本均刊刻於明崇禎八年（1635），且都藏於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sup>55</sup> 惜筆者尚未得見。

## （二）〈脩身則道〉一節

此篇制藝同樣未見錄於《湯顯祖全集》。目前共有三種選本收錄此文，其中兩種為明選本、一種為清選本。筆者目前可見的版本，收錄於清人俞長城（1668-1722）<sup>56</sup> 所編《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清乾隆戊午（1738）文盛堂懷德堂同重刊本，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後者為殘本。<sup>57</sup>

<sup>51</sup> 所謂「墨卷」，即考生所作之文，而「程文」則由主司擬作。龔篤清，《中國八股文史·明代卷》，頁 61。

<sup>52</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馮汝宗刊本），頁 1a-9a。

<sup>53</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01b。

<sup>54</sup> 同前引。

<sup>55</sup> 鶴成久章，《明代八股文學史資料の整理と研究》，頁 49、76。周鍾為復社文人，崇禎十六年癸未科二甲第 4 名進士。至於韓敬（1580-?）則是湯顯祖的晚輩友人、湯賓尹的門生，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狀元。

<sup>56</sup> 俞長城乃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賜同進士出身。

<sup>57</sup>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戊午（1738）文盛堂懷德堂同重刊本）。

其選本收錄的湯顯祖制藝計有七篇，其中〈脩身則道〉見於卷二十二。文附側批，文後錄周介生（周鍾）、章大力（章世純，1575-1644）及俞長城之總評。<sup>58</sup> 俞長城收錄的〈脩身則道〉，末段從「以此昭人君理道之原」至「願君舉行之而收其效」，計 72 字，篇幅符合萬曆初年「大結」字數之規限。惟正如前文所說，明清兩代的制藝版本一般差異明顯。《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對湯氏另一篇制藝〈孔子有見〉曾進行篡改（詳見下文），故不排除此篇亦有被清人竄改的可能。

另據日本學者鶴成久章考證，此篇目前尚有兩種更早的版本傳世，即韓敬所編《歷科程墨文室十帙》及周鐘所編《皇明程墨紀年四科鄉會程墨紀年》。<sup>59</sup>

### （三）〈孔子有見〉三句

本篇最早由龔重謨於 1982 年發現，原收錄於清人王介錫所編《明文百家萃》中。該選本刊刻於清順治乙未（1655）春王正月，現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sup>60</sup> 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sup>61</sup> 前者為殘本。<sup>62</sup> 後此篇由徐朔方增補至《湯顯祖全集》，見錄於卷五十一「補遺」。<sup>63</sup> 徐朔方依據王介錫本「故癸未《孟》墨，必推此文為第一」之總評，推斷此篇實為湯顯祖癸未科會試的墨卷。<sup>64</sup> 在過去四十年間，龔氏發現的版本一直被視為〈孔子有見〉的唯一版本。<sup>65</sup> 惟據筆者考證，除《明文百家萃》外，目前收錄此篇的尚有三種明代及一種清代選本。此篇最早的版本，同樣見於湯賓尹的《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其中共收錄了四位該屆考生的同題作品，依次為第 1 名李廷機、第 2 名鄒德溥、第 30 名孟養浩及第 65 名湯顯祖。各文篇後同樣附有湯賓尹的總批。<sup>66</sup> 比較《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及《明文百家萃》之版本，兩者除了用字略有不同，前者末段從「孟子家法孔氏」至「吾以為不若篤于教、廉于仕者」，計有 94 字，而後者則將此段完全刪去。

同樣是根據鶴成久章的考證，此篇還見錄於兩種明末選本，分別為韓敬《歷科

<sup>58</sup>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戊午（1738）文盛堂懷德堂同重刊本），卷 22，頁 49a-50a。

<sup>59</sup> 鶴成久章，《明代八股文學史資料の整理と研究》，頁 49、76。

<sup>60</sup> 王介錫，《明文百家萃》（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乙未（1655）春王正月刻本）。

<sup>61</sup> 王介錫，《明文百家萃》（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乙未（1655）春王正月刻本）。

<sup>62</sup> 龔重謨，《湯顯祖研究與輯佚》（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頁 207。

<sup>63</sup> 湯顯祖，《湯顯祖集全編》，卷 51，頁 2211-2212。

<sup>64</sup> 同前引，頁 2212。

<sup>65</sup> 饒芳、劉昌衍，〈湯顯祖科考試卷佚存略考〉，頁 179。

<sup>66</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10a-110b。

程墨文室十帙》及周鍾《皇明程墨紀年四科鄉會程墨紀年》。<sup>67</sup>此外，筆者還發現此篇亦被清人俞長城收錄於《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中。<sup>68</sup>可儀堂本的結尾同樣有被刪節的情況。對照兩種清代制藝選本，其中作品不少都按湯賓尹的修改建議竄改了原文。因此，《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很可能是多種清代制藝選本的共同底本。在筆者寓目的三種明清選本中，當以湯賓尹《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所收錄的〈孔子有見〉最接近湯顯祖之作的原貌。

#### 四、明清選本中的湯顯祖會試制藝

明清制藝選本繁多。過往有關湯顯祖制藝的研究，往往只針對新發現的文本進行分析，而忽略了這些作品得以保存的背景因素。明清制藝選集的編選動機和傾向，以及當時讀者的閱讀意圖，對辨識湯顯祖制藝作品的原貌，以及其制藝風格的轉變，都有一定意義。因此，在進一步分析湯顯祖「四書」義會墨的內涵前，筆者欲先廓清明清制藝選集出現的時代背景，以期更準確地解讀湯顯祖的會試制藝。

《湯海若先生制義》是現存惟一可考的湯顯祖制藝選集。相信徐朔方把集中所有制藝收入《湯顯祖全集》，並補入龔重謨收錄自《隆慶四年江西鄉試錄》及《明文百家萃》的選篇，目的是儘量保存湯氏作品，以求其「全」。惟後來論者大多將制藝視為湯顯祖研究的分支，依據《湯顯祖全集》所錄制藝，配合湯顯祖生平細瑣，進行分析和推論。至於對《湯海若先生制義》和《明文百家萃》的來歷和刊刻背景、湯氏制藝的流傳情況、明清應試制藝的定義及其體式之差異、明清兩代制藝選集與出版市場的關係等問題，均缺乏詳盡的考述。資料的不完整，致使學界對湯顯祖制藝仍有相當多的疑問：到底湯氏的會試制藝是否不合應試規範，致使他以低名次通過殿試？

明代歷屆會試制藝最早的刻本，應是明代官方刊刻的《會試錄》。明代各科秋試（鄉試）、春試（會試）完畢後，官方都會按當屆試題，依次選出各題第 1 名考生的作品，錄於《鄉試錄》及《會試錄》中，作為上呈的官方歷史文獻檔案。譬如《隆慶四年江西鄉試錄》中，就收錄了該屆《書》房經魁湯顯祖的制藝〈次九曰嚮用五福〉。至於湯顯祖的會試制藝，由於他當年僅以第 65 名通過會試，因此即使

<sup>67</sup> 鶴成久章，《明代八股文學史資料の整理と研究》，頁 49、76。

<sup>68</sup>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卷 22，頁 62a-63a。

《萬曆十一年會試錄》沒有佚失，其制藝亦理應不被錄於《會試錄》中。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官刻的《會試錄》、《鄉試錄》都必須經過皇帝御批才能刊刻，因此其中所收錄的制藝作品，校勘最為精確，最能展示作品的原貌。

湯顯祖的會試制藝既不可能見於《會試錄》，各篇的下落只能在明清時期非官方制藝選本的文海裡追溯。明代坊刻書籍市場，尤重科舉中式者的應試制藝。<sup>69</sup>坊刻的制藝選本約始見於明代成化年間。<sup>70</sup>制藝選集之出版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是給士子提供考試範文。其二，是透過選篇和評點，以申明編者的文學主張。<sup>71</sup>

由於應考科舉的士子逐年遞增，出於士子備試的參考需要，明清坊刻的制藝選本便開始流通於書籍出版市場。<sup>72</sup>如上文提到湯賓尹的《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韓敬的《歷科程墨文室十帙》、清人王介錫的《明文百家萃》，均屬此類。這些坊刻選本的編彙者，有的為進士出身，亦有的是屢試不第的布衣。坊刻選本的出版，固然是以盈利為目標。因此這些選本所錄的作品，類型包羅萬有，除了鄉、會程墨，亦有房稿、行卷、社課，<sup>73</sup>八股文社的社藝、會稿，<sup>74</sup>甚至落第士子之作，<sup>75</sup>質量良莠不齊。坊刻選本的讀者既以參加科舉為目標，是故編者選錄作品時往往因應明清考試規範轉變等原因，竄改增刪原文，以迎合當時的考試規定。<sup>76</sup>因此，坊刻選本雖然收錄大量明人制藝，但版本並不一定可靠。

明萬曆中期以降，隨著各種制藝流派的誕生，各派成員開始熱衷於透過選編及評點名家制藝，以申明他們的文學主張，有時甚至由此展開文學論戰。<sup>77</sup>湯顯祖的門生陳際泰和艾南英（1583-1646）、復社的馬世奇（1584-1644）、吳應箕（1594-

<sup>69</sup>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14.

<sup>70</sup> 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27.1（臺北：2009），頁 144。

<sup>71</sup>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29-130。另參見曾肖，《復社與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頁 106-109；何朝暉，《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211-213。

<sup>72</sup> 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頁 89-90。

<sup>73</sup> 清人顧炎武（1613-1682）指出：「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 16，〈十八房〉，頁 841。

<sup>74</sup> 曾肖，《復社與文學研究》，頁 106。

<sup>75</sup> 沈俊平，《舉業津梁》，頁 139。

<sup>76</sup> 胡梓穎，〈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頁 116。

<sup>77</sup> 曾肖，《復社與文學研究》，頁 240-245。

1645)、張采(1596-1648)、周鍾、陳名夏等，都是當時享負盛名的選家。譬如陳名夏的《國朝大家制義》即屬此類。<sup>78</sup> 該選本合共收錄了五十六家制藝。徐朔方錄入《湯顯祖全集》的《湯海若先生制義》，就是陳名夏選錄五十六家的其中一卷。《湯海若先生制義》中收錄的十多家評點，來自不同流派，故評點時有意見兩極的情況。<sup>79</sup> 陳氏所錄篇章傳達了個人的立場及喜好。集中既不錄湯顯祖的應試制藝，亦不錄其早期（鄉試以前）之作；至於晚期（會試以後）的作品，被錄入的為數亦不多。究其原因，湯顯祖前期學習王鏊、錢福之作，晚期則鑽研唐宋派歸有光(1507-1571)、胡友信(1516-1572)的風格，兩者皆屬八股「正格」。陳名夏在選集的評語中明確指出，他篩選湯氏作品的其中一個原則，是盡量不選錄湯顯祖改寫歸有光等人之作。<sup>80</sup> 由此可知，《湯海若先生制義》只收錄了少量湯氏晚年之作，而沒有入選的作品應是傾向唐宋派的風格。<sup>81</sup> 至於陳名夏所選錄的湯顯祖制藝，文字風格多傾向六朝，思想上則經常援引釋、道二家入儒。可以說，《湯海若先生制義》所錄的作品，皆屬湯顯祖的創格；可見陳名夏對五十六家制藝的選篇傾向，大概是以展示明代制藝各種風格之源流為目的。

清初面世的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則繼承了唐宋派「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張。選集中收錄的十多篇湯顯祖制藝，近半未見於陳名夏的選集。俞氏的制藝主張和選文傾向，更影響及乾隆年間由方苞等人奉命編選的《欽定四書文》。<sup>82</sup> 《欽定四書文》的編纂，主要是官方有鑑於明末清初制藝發展的各種流

<sup>78</sup> 陳水雲、黎曉蓮，〈陳名夏的八股文批評述略〉，《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3.1（武漢：2010），頁97。

<sup>79</sup> 該選集的評點者除了陳名夏本人，還包括不少與湯顯祖關係密切者，諸如其晚輩友人韓敬、門生艾南英、國子監司業張鼎(1572-1630)、國子監祭酒陳仁錫(1581-1636)，還有湯顯祖三子湯開遠(1598-1640)、四子湯開先（生卒年不詳）的復社文友諸如張自烈(1597-1673)、馬世奇、周鍾，以及吳長卿、洪羽生等人。從書中引錄十多家評點的內容可知，晚明文人對湯顯祖這批練習之作毀譽參半，但褒貶雙方都不約而同指出，湯顯祖的制藝肖似六朝文、風格纖弱，並常援引佛、道二教語，有別於制藝主流的雄渾風格，在當時可說是別調。

<sup>80</sup> 陳名夏在制藝〈父為大父〉的總評中指出：「先生改〔歸〕震川稿，無一佳者。予皆置之。不欲以截長補短之文示天下也。」湯顯祖，《湯顯祖集全編》，卷50，頁2066。由此可知，陳名夏在輯錄《湯海若先生制義》時，只選錄了少量湯氏晚年之作。

<sup>81</sup> 湯顯祖的門生羅萬藻(?-1647)曾提及，其師「晚乃喜改〔歸〕震川、〔胡〕思泉之作以自就」。羅萬藻，《此觀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2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躍齋刻本），卷1，〈王子美制藝序其二〉，頁346。歸有光和胡友信都是唐宋派的制藝名家。「喜改」二字，一方面說明湯顯祖晚年的制藝風格較傾向唐宋派，另一方面亦側面透露未被陳名夏收錄的湯氏晚年制藝，應該不在少數。

<sup>82</sup> 汪群紅、宋志強，〈俞長城制義理論述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0.5（南昌：2017），頁115。

弊，而作出干預以「正文體」，<sup>83</sup> 透過選文來確立「主司之繩尺，群士之矩矱」。<sup>84</sup> 方苞乃桐城派的古文大家，其選文的最高標準，繼承了明代唐宋派歸有光、唐順之「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張。<sup>85</sup> 其選篇尤其強調制藝代聖人立言論道之嚴肅性和正統性。方苞雖言「隆萬為明文之衰」，但同時指出隆萬文有優劣兩端。其中所謂優者，「必氣質端重，間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sup>86</sup> 《欽定四書文·隆萬卷》中共收錄了七篇湯顯祖的制藝。除了鄉試墨卷〈我未見好〉，其餘六篇皆非應試制藝。由此可見，雖然湯顯祖的部分制藝偏離正統格範，但亦有合於規範之作，可作「後學之津梁」。<sup>87</sup> 方苞與陳名夏選文標準之間的差異，說明湯文風格多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傳世的《欽定四書文》乃重刊本，見錄於《四庫全書》中，<sup>88</sup> 而該書的原刻本已佚。<sup>89</sup> 其原刻本的各篇原本附有方苞的總批和側批，而今本側批已不復見，這大概與乾隆時期文網森嚴有關。<sup>90</sup> 至於湯顯祖的制藝作品，在今本中亦有刪削情況。<sup>91</sup> 因此，《欽定四書文》收錄的湯顯祖制藝，大概均非湯文原貌。

綜上可知，明清制藝選本中收錄的湯顯祖制藝，既有不囿於規範的作品，亦有符合八股正格的作品。陳名夏《湯海若先生制義》的選篇傾向，在明清選家中當屬特例。故若僅就陳名夏的選本來評價湯氏制藝的成就，結論難免偏頗、片面。此外，湯顯祖制藝作品的流傳，先後歷經坊刻選本對湯氏原文的竄改，以及乾隆時期官方的收編，無疑影響到今人對湯文的了解和評價。

<sup>83</sup> 蒲彥光，《明清經義文體探析》（臺北：花木蘭文化，2010），頁26。

<sup>84</sup> 方苞等編，《欽定四書文》，卷首，〈論〉，頁1a。

<sup>85</sup> 蒲彥光，《明清經義文體探析》，頁30-31。

<sup>86</sup> 方苞等編，《欽定四書文》，卷首，〈凡例〉，頁1b。

<sup>87</sup> 同前引，〈論〉，頁1b。

<sup>88</sup> 方苞等編，《欽定四書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4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sup>89</sup> R. Kent Guy, "Fang Pao and the *Ch'in-ting Ssu-shu-wen*,"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51.

<sup>90</sup> 蒲彥光，《明清經義文體探析》，頁31。

<sup>91</sup> 胡梓穎，〈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頁116。



## 五、湯氏應試制藝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構思

湯顯祖乃一代才子，無論是戲曲還是詩文創作，他都追求藝術上的突破。然而，追求突破的意向，卻正與制藝規範的內容和嚴密的八股功令衝突。正如前文所述，萬曆初年八股制藝的結尾最少有兩項規範，即：不許涉及本朝事，以及字數以百餘字為限。在結尾的短短數行之中，如何翻出新意，是湯顯祖最關心的問題。

湯顯祖乃明代舉足輕重的戲曲家，尤其擅於塑造人物。制藝既是「代聖人立言」之文章，可以想見，湯氏描摹人物的天分能在寫作制藝時大派用場。代聖人立言，先要代聖人立心。立心之本固然關乎考生對經典的理解，但正如清人江國霖(1811-1859)所言：「吾故曰制義雖代聖賢立言，實各言其心之所得者也。」<sup>92</sup>可見所謂立心，不僅關係到考生如何揣摩聖人之心，還牽涉到考生如何理解並闡釋聖人之言。簡言之，考生需要在聖人思想的範圍之內，構思自己希望透過代聖人立言帶出什麼訊息。故此，制藝雖然只有正文部分才需要「入口氣」——以聖人的口吻表述聖人的思想；但開端如何鋪墊，結尾如何帶出文章的立意，都必須在下筆前仔細構思，以銜接聖人的思想與考生的立意。

時空交替是制藝體式的先天框架。正如前文所述，制藝代聖人立言的部分只限於正文的股對，而文章的開端和結尾，都是作者自身的話語。就時空而言，聖賢既為古人，而湯顯祖身處明代，因此其文的開端和結尾部分的時代背景都是明代，而正文立言部分則為古時。代聖人立言時，作者固然要考慮古人的時代背景，和與之相應的情感；至於「出口氣」後，作者就聖人之說辭自出己意，則不要求附帶情感。惟湯顯祖的會試制藝卻擅於在「入口氣」前、「出口氣」後，承接古人的情感，悲於古人之悲，嘆於古人之嘆，以古人之情貫穿全文並打動現世的讀者。值得注意的是，能通過考核的會試墨卷，必然是謹守官方頒布的《四書章句集注》及「五經」注本而撰，不能越矩。因此，透過對照湯顯祖的「四書義」墨卷和朱熹(1130-1200)的《四書章句集注》，只能說明湯文是否謹守朱注。至於要進一步勘察湯文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構思上的特徵，則需要透過比讀其同屆考生的同題作品，方能得到充分展現。由於目前傳世的湯顯祖會試制藝，最早見錄於湯賓尹的《睡庵

<sup>92</sup> 陳水雲、陳曉紅校注，《梁章鉅科舉文獻二種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制義叢話》，江國霖〈制義叢話序〉，頁6。

評選歷科鄉會墨卷》，而此選本中又同時收錄了湯顯祖及其同屆考生的作品。因此，本文將以湯賓尹收錄的〈吾之於人〉、〈孔子有見〉二篇為例，先考察其文在何等程度上嚴守朱注，再透過同屆考生作品的比讀，剖析湯氏萬曆癸未會試制藝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構思。

### (一) 〈吾之於人〉全章

〈吾之於人〉題目出自《論語章句·衛靈公第十五》，記述孔子論及《春秋》褒貶他人的準則：「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sup>93</sup> 孔子指出自己（撰寫《春秋》時）不會輕率地讚譽他人。他又認為夏、商、周三代的百姓普遍都具備「直道而行」的品德。所謂「直道」，意即正直、無私曲。回答此道題目，考生須要闡釋何謂「毀譽」、「直道」，比較「三代」與「斯民」是否知所「曲直」，並總結出孔子於人「無所毀譽」。茲引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釋文與湯顯祖制藝的相關字句如表一，以作比較：

表一：《四書章句集注》釋文與湯顯祖制藝對照示例

例子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sup>94</sup>	湯顯祖〈吾之於人〉全章 <sup>95</sup>
例一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中二股）蓋毀也，是非行之厚也，固吾所不敢出也。即譽也，必嘗試之言也，亦吾所不敢過也。
例二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起講）民有是非在矣，無所于枉直之至也。無論上下今昔，皆當以斯直行之斯民也。 （小結）吾有是非而已，毀耶譽耶，非吾所以行于人也。

對照《四書章句集注》與湯文，可知此篇對朱注亦步亦趨，完全符合萬曆時期的制藝規範。觀乎湯顯祖之墨卷，從破題、承題、起講、入題、束二股以至小結，

<sup>93</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8，頁166。

<sup>94</sup> 同前引。

<sup>95</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101b。

都是圍繞著「直道」、「三代」、「斯民」、「曲直」幾個觀念展開討論，而起二股、中二股、承題和小結，則以有關「毀譽」的討論貫穿。

除了謹守朱注，湯顯祖亦對文章作了精心佈局。作者於破題即指出孔子「寄慨深矣」，引起讀者的懸念：孔子因何慨歎？然後在承題部分，湯氏雖未代入孔子的口吻，卻已代入孔子的思緒，設想孔子是慨歎於現世大道的崩壞，才特意表彰三代先民。湯顯祖設想孔子因「寄慨深矣」而復行古之大道，乃是依據《禮記·禮運》的記載：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sup>96</sup>

孔子有志於復行古之大道，是儒家學說一切論述的起點。湯顯祖把握著試題中「三代」、「直道」兩個關鍵詞，貫通《論語》與《禮記》所記的孔子思想，巧妙地借用《禮記》敘述孔子與言偃（子游，506 B.C.-443 B.C.）對話的場景，建構出〈吾之於人〉的論說背景，完整地展示孔子從對世道失望、慨歎到立志復行大道，其思想與情感轉變之歷程，將孔子莊嚴的聖人形象，刻劃成有血有肉的賢者形象。湯顯祖就著孔子立志的背景，設想孔子（在《春秋》中）毀譽他人的原始動機，指出孔子的目的並不在於褒貶的舉動本身，而是意在復行古道。接著，湯氏就以三代斯民「直道而行」為論說基礎，確立孔子褒貶他人的標準。湯顯祖指出自三代以降，人們對正直之道的追求日漸式微，然後代入孔子的思考模式：如果人民都能辨別是非曲直，則無須透過褒貶人物來向人們展示是非曲直。無論古今的統治者，都應該培養具備正直品德的人民。可惜自三代以後，統治者都不以直道培養人民，純樸的民風於是漸漸消失，而不公正的論述則不斷滋長，人民亦不再以品行正直為貴。

湯顯祖為文章定調以後，在正文部分便代入孔子的口吻，採用八股格來展開論述：「孔子」首先說明自己毀譽他人並無私心，其目的僅在於辨明是非公義。「孔子」又認為，貶毀他人乃有違溫柔敦厚之舉，故他不會輕易出言批評，只會恰如其分地評價，實話實說。過渡到後四股，「孔子」進一步比對近世與三代之民風。「孔子」指出近世的風氣不重視品行的真誠正直，而三代的統治者的品行則與大道

<sup>96</sup> 鄭玄注，孔穎達疏，黃侃句讀，《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21，頁411。

諧協，其品行的曲直能給民眾起著示範作用。其中「登纂順之民」句，湯賓尹的側批於此句開端加入「以」字，使之與上句的「以薄真誠之化」對稱。「以」字之缺，大概是湯顯祖在應試時的漏失；如此些微漏失，正從側面證明此版本所呈現的很可能是墨卷的原貌。過渡到束二股，「孔子」進一步以是非作對比，強調三代用刑法來束縛人民，其公正性仍維持至今，然而三代時期忠厚誠實的風氣，卻使今人嚮往。

湯顯祖這篇制藝結構巧妙之處，在於完成八股「代孔子立言」之後、進入作者評論總結的「大結」之前，加插了「小結」的部分，先讓「孔子」以第一人稱作小結，剖白自身的兩難處境：

吾既不得行三代于上，不得行三代于下。吾既不能取斯民而王之以直道之治，乃欲枉斯民而被之以不直之名。如吾民何？如吾盛世之思何？吾有是非而已，毀耶譽耶，非吾所以行于人也。<sup>97</sup>

「孔子」既嚮往三代民風，然而現今世風卻不復古時。他既無法推動今人奉行三代之直道，同時又不甘心讓今人走三代以後的道路。糾正民風，必由統治者開始。是故孔子要改變民風，亦必由說服君王奉行直道開始。「孔子」說，他無法令君王「王之以直道之治」，卻仍有是非之心。因此，他希望（藉著撰寫《春秋》）貶斥不奉行正道的君王，以正視聽，以化人民。這是孔子毀譽他人的初衷。此「小結」部分，與「起講」及「入題」部分的內容遙相呼應，構成「代聖人立言」的完整論述。在完成「代孔子立言」的部分後，湯顯祖便「出口氣」總結道：

噫！夫子慨深，待民厚矣。人之生也直，使師保之，勿使失性。三王之所務也。不以性曰，囂囂然以刑賞為事，而俗流失志，在《春秋》，志三代之英也。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直也，其以維持皇極三德，深乎！<sup>98</sup>

湯顯祖重申，孔子心繫人民，是故對「直道」之風的失落，感慨尤深。「師保」意

<sup>97</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01b。

<sup>98</sup> 同前引。

指教養。<sup>99</sup> 湯氏認為統治者必須教養人民，勿讓人民失卻人之本性，<sup>100</sup> 並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致力於教養人民，並透過刑罰和賞賜來統治人民。湯氏繼續指出，後來民風改變，人民逐漸失去意志，孔子才逼不得已作《春秋》，標榜三代英明君主之德，以作後人的楷模。湯氏總結說，《春秋》乃盡性之書，<sup>101</sup> 標榜奉行直道。此書的作意在於維持「皇極」和「三德」，即帝王統治天下大中至正之道，<sup>102</sup> 以及正直、剛克、柔克的人君之德，<sup>103</sup> 其中褒貶意義深刻。文中所謂「三代之英」，與破題的「寄慨深矣」皆語出自《禮記·禮運》的同一段經文，可見湯顯祖在佈置本文背景、運用典故時，已考慮到「入口氣」前和「出口氣」後的前後呼應。

從以上討論，可知湯顯祖的〈吾之於人〉符合萬曆時期的制藝規範，嚴守朱子家法，似乎沒有什麼思想內涵可言？然而，湯賓尹在評語中卻指出湯文的議論和構思佈局都是別出心裁：「曰直道，曰行，曰所以，曰斯民，曰吾之于人，就箇中吐納，卷舒不復，妄舒一藻，別勑一議，乃知文有真奇。」<sup>104</sup> 他認為湯顯祖能把握並圍繞著題目的幾個關鍵觀念展開論述，其中言論或顯或隱而不重複，行文從容而文采斐然。值得注意的是，湯賓尹指出湯文「別勑一議」，屬奇文一篇。到底一篇符合規範的制藝，如何能在議論中另闢蹊徑？正如前文所論，制藝的大結往往包含著考生的「思想內涵」。此處不妨對照當屆會元李廷機、第 3 名王堯封、第 23 名梅鵬祚、第 150 名陳其志同題制藝的大結，如表二：<sup>105</sup>

<sup>99</sup> 古時輔弼帝王和教導王室子弟的官，有師有保，統稱「師保」。《易·繫辭下》有云：「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黃侃句讀，《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第 1 冊，卷 8，頁 176。《書·周書·君陳》又云：「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蔡沈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6，頁 265。

<sup>100</sup> 《易·繫辭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穎達疏：「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 7，頁 150。

<sup>101</sup> 《易·說卦》有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穎達疏：「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同前引，卷 9，頁 185。

<sup>102</sup> 帝王統治天下的準則，即所謂大中至正之道。《書·周書·洪範》云：「五，皇極：皇建其有極。」蔡沈，《書集傳》，卷 4，頁 165。

<sup>103</sup> 《書·周書·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同前引，頁 168。《周禮·地官·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鄭玄注，賈公彥疏，黃侃句讀，《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4 冊，卷 14，頁 209。

<sup>104</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01b。

<sup>105</sup> 正如前文所述，《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本共收錄了六篇同題作品。惟其中第 38 名顧允成的文章，在起講部分寫道：「想其〔孔子〕意曰」，然後即代入孔子口吻至文末，未有「出口氣」作總結。在欠缺「大結」的情況下，本文只能就其餘五篇作品的大結作比較。

表二：萬曆十一年會試制藝〈吾之於人〉試卷舉隅

考生	大結
李廷機	抑聖人無毀譽，其大者乃在《春秋》。《春秋》所書，褒善貶惡，賢賢黜不肖，率奉直道以從事，而聖人無心焉。此所以繼三代存人心，為萬世法也。即使得位以賞罰，天下詎能若是遠哉！故夫子自言亦曰：「志在《春秋》。」 <sup>106</sup>
王堯封	吁，聖人之思遠矣！斯言也，其作《春秋》之權輿乎。三代之英，志竟莫逮，而僅以筆削自寄，至知我罪我，莫能自必。而又屑屑焉為毀譽解，聖心其滋戚已。雖然，孟氏論功至典，神禹平成、姬公魚驅，埒則空言，奚遜寔事哉。 <sup>107</sup>
梅鵬祚	吁，此夫子行王道之志也。嗟乎！以夫子盛德，當《春秋》之際，而猶然不兌於孫輩之口。毀譽之不足信久矣。夫子傷之，故托此言也。雖然其作《春秋》，何也？噫！作《春秋》，正無毀無譽之見諸行事者也。 <sup>108</sup>
陳其志	噫！夫子之言，固待天下以長厚之道，而其感則深矣。 <sup>109</sup>

對照四位考生的大結，除了陳其志所作大結篇幅較短，其餘三人都把字數控制在九十至百字之間。由於篇幅所限，考生們都必須準確選出最重要的觀點，置於大結之中。其中李廷機、王堯封、梅鵬祚所作大結，均指出《春秋》的善惡褒貶，反映了孔子的道心乃繼承自三代的統治者，是歷代統治者效法的榜樣。其中心思想始終圍繞著歌頌聖人及聖人之書。三人均提到「《春秋》」和「毀譽」，而李、王二人又進一步論及「三代」。此外，王堯封言「聖心其滋戚」、梅鵬祚謂「夫子傷之」、陳其志則說夫子「其感則深」，三人不約而同指出孔子因世道崩壞而感慨憂傷。觀乎幾位考生所作大結，內容高度雷同，反映他們都熟讀舉業應試教材。

反觀湯顯祖的文章結尾，雖然亦提到「《春秋》」、「毀譽」、「三代」和「夫子慨深」數端，但其文的佈局、立意、人物刻劃等方面，顯然與其他五位考生不盡相同。首先，在佈局上，湯氏透過加入「小結」以拓寬「大結」的議論空間。文中「大結」計 75 字，完全符合會試的規範。惟他特意在「大結」前加入計 73 字的「小結」。從文章實際的內容觀之，其中「小結」亦發揮著總結全文的功能。換言之，湯文是在符合規範的情況下，將其結論的討論空間拓展到 148 字。其次，在立意上，其他考生處理這道題目的「大結」時，一般都將注意力集中在「誰毀誰

<sup>106</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97b。

<sup>107</sup> 同前引，頁 98b。

<sup>108</sup> 同前引，頁 99b。

<sup>109</sup> 同前引，頁 102b。

譽」的議題上，並以三代斯民「直道而行」為例，以加強文章的說服力。至於湯顯祖則別出新意，選擇將「誰毀誰譽」的討論置於「小結」之中。湯文在「大結」中「別勑一議」，將注意力集中在闡釋《春秋》的內涵，而非有關「毀譽」的討論。其餘幾位考生雖然都提及《春秋》，但卻只有湯顯祖從「盡性」的角度討論。「盡性」之語，並不是來自《論語》原文或朱注，而是源自《中庸》：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sup>110</sup>

儒家謂人性包含天理，唯至誠之人，才能發揮人和物的本性，使各得其所。至於湯顯祖將「盡性」與「師保」的觀念扣連，同樣是依據《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之語。<sup>111</sup>其三，在人物刻劃上，其他考生都只從第三人稱的角度，提及孔子對世道崩壞的憂傷；只有湯顯祖加入「小結」，從「孔子」的第一人稱角度，剖析他「毀譽」人物確是情非得已，勾勒出「孔子」對世道淪落的憂慮，抒情深刻真切。從以上三點，可知湯文雖然謹守朱注和「五經」注本，但他始終不忘在內容上翻出新意，在藝術上追求突破。湯賓尹評價此文「別勑一議，乃知文有真奇」，所言非虛。

## (二)〈孔子有見〉三句

〈孔子有見〉的題目出自《孟子集注·萬章章句下》。<sup>112</sup> 撰寫〈孔子有見〉的難處在於雙重代言。《孟子》經文記述萬章向孟子 (372 B.C.-289 B.C.) 請教交際之道，並由孟子闡釋孔子思想的背景。換言之，考生必須從孟子的角度，設想孔子的思想處境。孔子終生事道，以行道為志業。他從來重禮，行止有節，不為俸祿而敗壞名節。萬章因而問道於孟子，提出孔子出仕接受俸祿物資是否符合儒家大道的疑問。孟子回應說：「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sup>113</sup> 朱

<sup>110</sup>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32。

<sup>111</sup> 同前引，頁 17、32。

<sup>112</sup> 同前引，《孟子集注》，卷 10，頁 320。

<sup>113</sup> 同前引。

熹注云：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sup>114</sup>

朱熹指出，孔子三次出仕，大概是事於季桓子 (?-492 B.C.)、衛靈公 (540 B.C.-493 B.C.) 及孝公，其中孝公身分不詳，估計是衛出公 (?-456 B.C.)。孔子先仕魯後仕衛，去職原因在於發現在魯大道不行。惟朱子認爲文中存有不可曉之處，不必勉強解說。雖然文義並不完全通達，但朱子還是表明了他對孔子出仕的看法，指出此乃義之所在。他又引尹氏之言，提及陵仲子的典故。由於原文無法完整解讀，朱子對孔子出仕的態度，遂成爲回應〈孔子有見〉考題的關鍵。惟朱子之注中並未詳述於陵仲子之事，是故考生或有需要透過「以經解經」的辦法解讀《孟子》原文。<sup>115</sup>據《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的記載，孟子曾與匡章論及陵仲子之事。仲子之兄陳戴爲齊國卿大夫，俸祿萬鍾。惟仲子以爲此乃不義之祿，故偕妻子隱居於陵，並號於陵仲子。匡章認爲陳仲子爲「廉士」，但孟子對此並不苟同。孟子認爲，於陵仲子的衣食居所，並非自給自足。他自以爲不依靠其兄供養，就是具備爲人之操守。然而，不事生產的仲子，其接受他人的供給，卻沒有深究所接受的是否不義之食。<sup>116</sup>朱熹因此注云：

<sup>114</sup> 同前引。

<sup>115</sup> 明代中葉以降，文章家在詮釋《四書章句集注》的經義時，往往強調讀書之重要性，並認爲此能補正朱熹《集注》的不足。然而，詮釋經義總不能無所依據。爲了維護經義文的純正，當時八股文家便採用「以經解經」之法。蒲彥光，〈守經、用經與背經——試論明代經義文如何解經〉，《興大中文學報》，34（臺中：2013），頁 54-56。當考生遇到《四書章句集注》解說未盡或有所缺之處，往往援引「四書五經」中的經文及相關注解，以朱子之語補充朱子之說。

<sup>116</sup> 《孟子集注·萬章章句下》云：「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6，頁 273-274。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sup>117</sup>

朱熹指出，於陵仲子自以為具備操守，但他「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並非真正的廉士。況且，仲子以為遠離兄母親戚、不事君主，就是恪守為廉之舉。事實上，他不僅非為廉士，而且是「無人倫」者，不符合儒家之義。

湯顯祖在文章開首，即點出「聖人」孔子，指出孔子每次出仕的原因不一，但都是「婉于為道」而已。其中「婉」字，刻劃出孔子出仕的委曲之情。在承題處，湯氏設想孔子為事道而焦急，故見國君養賢以禮便決定出仕。至於其道是否可行，必須經過實踐才能知道，又豈是開始出仕之時可以預見？在確立了文章的觀點後，湯氏便引領讀者走進孟子與萬章論辯的場景：「孟子與萬章論交際及此，……。」<sup>118</sup>先點出孟子與萬章二人在〈萬章下〉中論交際之前，已討論了數個問題。文中敘述孟、萬二人論交際「及此」，筆法與小說中以「卻說」起句近似。「孟子」開宗明義指出，孔子把握出仕的時機，目的是等待事道的機會；他接受俸祿只是權宜，其品格修養還是符合大道。繼而，「孟子」便引領萬章觀察孔子出仕的經歷，指出君子行道，無不始於重視自身的行為，然後再等待可以行道的機會。孔子行道之心醞釀既久，若遇到可以出仕的機會而不加以把握，便始終不能實踐其大道。因此，孔子只能略放寬其原則，接受俸祿，委曲自己以就其位，以期完成他的志業。

在確立全文主旨後，湯顯祖於正文部分即代入孟子的角度，先以「際可」、「公養」之仕對舉，指出遇到向君主行道的機會，自然便有接見的禮儀。或若君主能以禮交際、供養賢士，孔子有見於對方能以禮交際、培養賢士，便與之揖讓交際，姑且受其飲食俸祿，期待日後能夠遇到行道的機會。換句話說，孔子出仕意不在俸祿本身，而是將仕官視作奉行大道的機會。過渡到第三、四股，「孟子」進一步指出，各人際遇雖有不同，但可以奉行大道的機會還是常常隱伏於仕官的機遇之

<sup>117</sup> 同前引，頁 274。

<sup>118</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10a。

中，因此必須把握機會，不宜墨守成規。孔子行道的意志堅定，因此不應詬病孔子迎合世俗以接受出仕機會。在湯賓尹的選本中，湯顯祖在第四股和大結之間，加入了小結部分作為孟子論說的結語：

小結 婉哉！孔子之為道也，又何疑于魯俗之從、交際之受乎！

大結 孟子家法孔氏，賸世子問性善，井田遠方來歸，几乎孔子之在魯，其他抗禮傳食，自以有功不為泰，亦其道也。嗟夫！童子進談帝王之道，燕趙擁篲乎！嘗養士固不足云，乃有儒者趨時，託于大道委蛇屈身信道之說，吾以為不若篤于教、廉于仕者。<sup>119</sup>

孟子總結孔子只是委婉地行道，又何須懷疑他在魯國從俗出仕是為了自身利益？在小結中的「婉哉」句呼應破題的「婉于為道」句。至於清代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及王介錫《明文百家萃》的版本，除了用字略有不同，其文的結束方式亦差異明顯。俞長城及王介錫的選本均把大結文字完全刪去，並將小結文字修改為：「妙哉！孔子之為道也。又何疑于魯俗之從，多際之受乎。」<sup>120</sup> 以作為全文的結語。俞本、王本所作改動，乃迎合清代應試制藝篇幅短小、收題不許過度發揮的寫作規範。惟二本刪掉原文大結部分，不僅有損湯文原意，同時破壞了原文的結構美。

在大結中，湯顯祖指出孟子繼承孔子傳授的家法，他的出仕與孔子仕魯的情況相似。雖然孟子按照平等的禮儀，輾轉接受君主的供養，但他有功績卻依然生活簡樸，其品德修養仍是符合大道。孟子談論帝王之道，燕、趙國君都吩咐僕人恭敬地以擁篲之禮迎候他。湯氏認為，養士之事固不足道，但有些儒者迎合世俗潮流，假託踐行大道而表現出隨順委婉之貌，實在不如孔子的「篤于教、廉于仕」。其中所謂「廉于仕」，明顯是呼應朱注援引《孟子·滕文公下》有關於陵仲子的典故。湯賓尹在此篇的「搃批」中指出：「行可、際可、公養有季桓子三段，此間精神全在三『有』字，數舉似渾然天成。」<sup>121</sup> 至於王介錫則評道：「此題一落平實，便犯季桓文三段。義仍先生只于三『有』字着神，步虛即行，空靈莫比。故癸未《孟》

<sup>119</sup> 同前引，頁 110b。

<sup>120</sup> 湯顯祖，《湯顯祖集全編》，卷 51，頁 2211。

<sup>121</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10a-110b。

墨，必推此文為第一。」<sup>122</sup> 湯顯祖在文中把握著題目「孔子有見」中的關鍵字「有」，先描繪孔子見到行道的機會（「有見」），認為獲得官位便有行道的機會（「有所以行」），並等待行道的機會（「有之」），透過「有」字的靈活運用，打開不同的思考層面，以豐富其文所表達的意涵。除了湯顯祖的作品，湯賓尹亦同時收錄了同屆會元李廷機、第 2 名鄒德溥、第 30 名孟養浩 (1559-1621) 的同題作品。此處亦不妨對照諸篇之大結，如表三：

表三：萬曆十一年會試制藝〈孔子有見〉試卷舉隅

考生	大結
李廷機	抑記儒行者曰：儒有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蓄也。以孔子之聖，有際可公養之仕，而卒無三年之淹，則易祿而難蓄之說也。不有其易，則道不行，而不有其難，則道不尊。吁！此其所以為聖之時，而孟氏願學之者與。 <sup>123</sup>
鄒德溥	蓋用舍行藏，各有當也。戰國之士，談天炙轂，以干時寵，君有不合，且受而徇之，是何知進不知退哉！顧曰：聖人不能無後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噫！微去齊出晝之節，則聖人之家法隳矣！ <sup>124</sup>
孟養浩	彼其仕公養之心，亦即仕可行之心而已。迎机方就，已致慨乎明良虛文，何為者？聖人猶戀之也。感遇而留，己重傷乎機會鼎養，何為者？孔子亦棲之也。上下不親，委曲以行其志，机緘可乘，宛轉以投其交，聖人果非仕道乎哉！ <sup>125</sup>

綜觀幾位考生的「大結」，主要都是褒揚聖人之道、點出孟子對孔子家法的繼承。正如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給孔子的辯解：「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是故諸位考生均不敢怠慢，設法為孔子的出仕辯護。李廷機婉轉地指出：「不有其易，則道不行，而不有其難，則道不尊。」鄒德溥則先以「聖人不可無後身而涉世」，回應朱注中於陵仲子的典故，然後又提及孟子「去齊出晝」的經歷，<sup>126</sup> 指出孟子見齊國道不可行而去職，乃是孔子家法、聖人之道。孟養浩同樣是回應於陵

<sup>122</sup> 湯顯祖，《湯顯祖集全編》，卷 51，頁 2212。

<sup>123</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97b。

<sup>124</sup> 同前引，頁 98b。

<sup>125</sup> 同前引，頁 109b。

<sup>126</sup> 「去齊出晝」一語源自《孟子集注·公孫丑章句下》：「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4，頁 249。鄒德溥引此典故作為佐證，以展現聖人出仕之節。

仲子的典故：「上下不親，委曲以行其志，机緘可乘，宛轉以投其交」。相對來說，湯顯祖仍然是採用加入「小結」之法，先透過孟子之口，總結出孔子只是委婉地出仕，以求行道。然後，他在大結中進一步批評、諷刺「趨時」者為了自身利益而假意托於大道。「趨時者」之說，不見於《孟子》原文，亦不見於朱注，而其他考生亦未有提及，當為湯顯祖自己的觀點。由此可見，湯顯祖在撰寫此篇制藝的時候，實在費了不少心思於撰寫大結之上，除了講究內容上合乎規範，亦追求結構上的突破和抒發己見。其論述既繩於經解之內，其設想卻又不囿於經解的陳套。

## 六、結論

歷經清末廢科舉，以及五四新文學運動對八股之排斥，湯顯祖的制藝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難免陌生。然而，湯顯祖既被譽為明代「舉業八大家」之一，明清士子對其制藝作品肯定耳熟能詳。這從《湯海若先生制義》中的多家評點，以及湯文入選多種明清制藝選本乃至清代御製的《欽定四書文》，可見一斑。

過往論者普遍認為，湯顯祖於萬曆癸未科會試撰寫的三篇「四書」義，其中兩篇早已佚失。本文嘗試從明清各種制藝選本，追尋研究者以為今已不存的湯顯祖會試制藝之下落。透過對比湯氏會試制藝在湯賓尹、俞長城等選本內的存佚刪削情形，本文指出清代選本的編者為了迎合當時制藝的寫作規範，往往把湯文原本的「大結」刪改為「收結」。制藝結尾的刪改，不僅破壞了湯顯祖原文的結構美，同時削弱了其文的思想內涵。相對來說，本文所論兩篇由明末湯賓尹編輯的湯氏會試墨卷，都是以先「小結」後「大結」的方式結束，結構風格統一。兩篇「大結」的字數，均符合晚明的考試規範。再者，湯賓尹在〈吾之於人〉的側批中更曾添補湯文之缺字。綜合以上三點，筆者相信湯賓尹《睡庵評選歷科鄉會墨卷》所錄的兩篇湯顯祖會試墨卷，應該很接近其作品之原貌。

通過本文對〈吾之於人〉、〈孔子有見〉的分析，可知湯氏的會試制藝在風格上還是有別於平日練習之作，在內容上始終謹守朱注，在形式上不離八股功令。過往有關湯顯祖會試制藝有乖正統，致使他以低名次賜同進士出身的說法，至此亦不攻自破。正如王介錫所言：「玉茗堂制義，以古法行之，妙處在筆善轉而思善入，填詞贈答，亦復如是。」<sup>127</sup> 所謂「以古法行之」，說明湯氏制藝合乎正統規範。

<sup>127</sup> 王介錫，《明朝百家小傳》（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卷下，〈湯若士傳〉，頁92。

湯顯祖雖然始終未有在「大結」中論及本朝事，但在遵守會試制藝的嚴格規範的同時，他不僅代聖人抒情，亦代自己抒見，甚至另闢蹊徑屢創新見，忠於而不囿於萬曆時期應試制藝的書寫規範。劉熙載（1813-1881）在《藝概·經義概》中指出，優秀的制藝作品應能「尚奇而穩」。<sup>128</sup> 這大概是湯顯祖會試制藝的最佳註腳。

進士們及第的名次，直接影響他們進入官場後的官位編配。據《皇明貢舉考》所錄，萬曆癸未會試以李廷機名列第一，而「五經」經魁分別為李廷機（易）、鄒德溥（春秋）、王堯封（書）、王萱（禮記）及蕭雍（詩）。殿試以後，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的卻分別是狀元朱國祚（1558-1624）、榜眼李廷機，<sup>129</sup> 以及探花劉應秋（1549-1620）。五位經魁，僅李廷機位列一甲，其餘四位則歸入二甲。<sup>130</sup> 至於朱國祚及湯顯祖的好友劉應秋，<sup>131</sup> 會試表現一般，但殿試後卻高中。蓋因進士及第，考核嚴格，關卡重重，同時亦受地域名額分配所限。<sup>132</sup> 雖然湯顯祖的制藝早於隆慶時期已與歸有光齊名，但制藝僅屬會試第一場的考核內容，第二、三場還考核其他文體，再加以殿試的考核，完成殿試後排名有所升降，歷科如此，本為常事。歸有光是繼王鏊以後最重要的制藝名家，但他八應會試，直到接近耳順之年，<sup>133</sup> 才以第三甲 142 名獲賜同進士出身。<sup>134</sup> 由此可知，科考雖重首場，<sup>135</sup> 但士子制藝寫作的優劣，與最終名次並不必然掛勾。這亦可以說明，為何湯顯祖僅以低名次通過殿試，但其三篇會試墨卷仍能得到明清編選者一致的正面評價，多次入選明清選本，成為膾炙士子之口的應試範文。

本文發掘湯顯祖會試制藝的下落，展現其制藝作品流傳、佚失以至復現的經

<sup>128</sup> 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6，頁 182。

<sup>129</sup> 李廷機本為該屆狀元（殿試首名）。惟萬曆皇帝（朱翊鈞，r. 1572-1620）認為「連中三元」不可易得，有鑑於李廷機已先後高中解元（鄉試首名）、會元（會試首名），故僅賜其以榜眼及第。王介錫，《明朝百家小傳》，卷下，〈李九我傳〉，頁 81。

<sup>130</sup> 各人進士及第的排名分別為：鄒德溥（二甲第 22 名）、王堯封（二甲第 63 名）、王萱（二甲第 62 名）及蕭雍（二甲第 5 名）。見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 9，頁 538-539。

<sup>131</sup> 湯顯祖與劉應秋不僅是同年、知己，湯氏之女湯詹秀（1588-1594）與劉氏之子劉同升（1587-1646）更曾互為婚配。後婚事由於詹秀夭折而告吹。見湯顯祖，《湯顯祖集全編》，卷 12，〈平昌哭殤女詹秀七女二絕有序〉，頁 710。

<sup>132</sup> John Williams, "Identity Verification as a Standard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Martin Hofmann et al. (eds.), *Powerful Arguments: Standards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20), p. 363.

<sup>133</sup> 王介錫，《明朝百家小傳》，卷上，〈歸震川傳〉，頁 67。

<sup>134</sup> 張朝瑞，《皇明貢舉考》，卷 8，頁 502。

<sup>135</sup> 據《清史稿·選舉三》所述，鄉試、會試「名為三場並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四書藝為重。」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108，頁 3149。

過，不僅為湯顯祖研究的拼圖補回一塊缺片，亦從側面勾勒了明清刻書業、版本學、科舉制度等領域的概況。〈吾之於人〉、〈脩身則道〉二篇的重新發現，填補了過往湯顯祖制藝文獻空白的一頁。至於〈孔子有見〉明代版本的重新發現，亦揭示了該篇的原貌。湯顯祖的三篇會試制藝得以保存，當然是得力於明、清兩代龐大且蓬勃的制舉用書出版市場。遺憾的是，由於疫情等環境因素，筆者在完稿之際仍無緣得見〈脩身則道〉篇的明代版本，暫無法進一步探索。筆者相信，本文提及湯顯祖三篇會試制藝的各種版本，僅是鳳毛麟角。期待湯顯祖各篇制藝的多種版本能於日後陸續面世，讓學界能更進一步了解湯顯祖制藝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徵。

（責任校對：廖安婷）

## 附錄：湯顯祖萬曆癸未三篇會試制藝原文引錄

〈吾之於人〉全章<sup>136</sup>

- 破題 聖人自表其行直道于民，寄慨深矣。
- 承題 夫三代所以直道而治之者，即斯民也。聖人亦猶行古之道也，于誰毀譽乎！
- 起講 蓋自三代以還，直道之行微于上，而聖人欲以言挽之也。若曰：民有是非在矣，無所于枉直之至也。無論上下今昔，皆當以斯直行之斯民也。
- 入題 自夫不以直道行斯民，則醇白之化已遠，而又不以直道所常行之民待斯民，則枉曲之論由滋，斯無貴于行世者矣。
- 起二股 吾之于人也，  
意有所存，嘗竊取夫是非之義，  
言有所極，于誰行其毀譽之私。
- 中二股 蓋毀也，是非行之厚也，固吾所不敢出也。  
即譽也，必嘗試之言也，亦吾所不敢過也。
- 後二股 惟以斯民也，  
槩之于流風，固挽近世所曲而行之，以薄真誠之化。  
偕之于大道，即古先王所直而行之，登綦順之民。
- 束二股 有所非，三代之所以明，刑人而無敢以曲惡加焉者，即斯民也。公正之典，于今未忘也。  
有所是，三代之所以顯，設人而無敢以曲好加焉者，即斯民也。忠厚之風，于今可念也。
- 小結 吾既不得行三代于上，不得行三代于下。吾既不能取斯民而王之以直道之治，乃欲枉斯民而被之以不直之名。如吾民何？如吾盛世之思何？吾有是非而已，毀耶譽耶，非吾所以行于人也。
- 大結 噫！夫子慨深，待民厚矣。人之生也直，使師保之，勿使失性。三王之所務也。不以性曰，囂囂然以刑賞為事，而俗流失志，在《春秋》，志三代之英也。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直也，其以維持皇極三德，深乎！

〈脩身則道〉一節<sup>137</sup>

- 破題 聖人列九經之效，立極而通之天下焉。
- 承題 夫道立于己，感盖于人，大效也。而以九經得之，可不務與。
- 起講 夫子欲存周政于望國也，故告其君，若謂人主以身之道公之天下國家，亦必通家國天下之心于其身，所盡道也。臣舉為政之几，而知九經之不可已矣。始必效者也。試言之：

<sup>136</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 101b。

<sup>137</sup> 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卷 22，頁 49a-50a。

- 入題 人主，天下之表儀也。以道經物者也。不修則不立，誠修之，其所為精神法則者，粹于其下矣。道立而天下國家景從矣。
- 起二股 由是則尊賢焉，而賢者各以其等，輔精微也。是故尊賢而惑去。  
親親焉，而親者各以其殺，昭時展也。是故親親而怨忘。
- 中二股 大臣壹統類矣。敬之得以崇幾揆，而祛呈眩，固大臣所以忠其上之敬也。群臣明功分矣。體之得以修上節，而重報禮，固群臣所以心其上之體也。
- 後二股 百姓本也，而惟君上之所令也。子之人情競勸矣乎。  
百工末也，而皆官司之所財也。來之器用無關矣乎。
- 束二股 四方有遠賓旅矣，录之則歸望關尹而趨，謂吾撫循之者素也。  
天下有強諸侯矣，懷之則畏修岳職以處，謂吾顯比之者公也。
- 大結 以此昭人君理道之原，而建極之內無疵政。  
以此驗先王經綸之迹，而應感之際有全功。  
然則九經之効于天下國家，非細也，亦非迂。  
人存而敏於政者，良在茲與，願君舉行之而收其效也。

### 〈孔子有見〉三句<sup>138</sup>

- 破題 大賢言聖人不一其仕，婉于為道而已矣。
- 承題 甚矣聖人行道之心急也。際可則仕，公養則仕，又豈一于見行可也乎？
- 起講 孟子與萬章論交際及此，曰：一而未始不易者，仕合之時也；高而未始不中者，聖人之行也。是故仕魯為道明矣，吾因得歷觀聖人之仕焉。
- 入題 君子莫重乎始進，而机有所當乘，大人不欲速其功，而時有所難俟，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焉。聖人蘊道久矣，見可以仕，而又遲之以不仕，則是終不仕也。委曲以投其端，從容以竟其業。盖蚤見而薄施也；有所以行，非仕求可而已也。
- 第一股 夫見行可之于君也，自有晉接之礼，不在一交際矣。然天下卒未有能禮士者。而或有能禮際之君，觀于其際，亦能敬聖人也。與周旋焉，而待其後可也。是故際可之仕，孔子有之。
- 第二股 夫見行可之于君也，自有鼎養之祿，不在一餽養矣。然天下亦稀能養士者。或有一餽養之君，觀于其養，亦能周聖人也。姑飲食之，而觀其後可也。是故公養之仕，孔子有之。
- 第三股 遇有不同，而救世之机恒伏，固不當泥于根深以待時。
- 第四股 任有不一，而為道之意恒隨，亦不得病其希世而度務。
- 小結 婉哉！孔子之為道也，又何疑于魯俗之從、交際之受乎！
- 大結 孟子家法孔氏，賸世子問性善，井田遠方來歸，几乎孔子之在魯，其他抗礼傳食，自以有功不為泰，亦其道也。嗟夫！管子進談帝王之道，燕趙擁篲乎！崇養士固不足云，乃有儒者趨時，託于大道委蛇屈身信道之說，吾以為不若篤于教、廉于仕者。

<sup>138</sup> 湯賓尹，《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國家圖書館藏本），頁110a-110b。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萬曆十一年癸未科會試錄》*Wanli shiyi nian guiweike huishi lu*，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1583)抄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Fu Sinian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hiyi nian (1583) chaoben。
- 方苞 Fang Bao 等編，《欽定四書文》*Qinding Sishu wen*，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1742)刻、清道光補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Qianlong qi nian (1742) ke, Qing Daoguang bukeben。
- \_\_\_\_\_，《欽定四書文》*Qinding Sishu wen*，《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45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 王弼 Wang Bi、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黃侃 Huang Kan 句讀，《周易正義》*Zhouyi zhengyi*，《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0。
- 王介錫 Wang Jiexi，《明文百家萃》*Mingwen baijia cu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乙未(1655)春王正月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Shunzhi yiwei (1655) chun wangzhengyue keben。
- \_\_\_\_\_，《明文百家萃》*Mingwen baijia cui*，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乙未(1655)春王正月刻本 Fudan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Shunzhi yiwei (1655) chun wangzhengyue keben。
- \_\_\_\_\_，《明朝百家小傳》*Mingchao baijia xiaozhuan*，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shanben。
- 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shu zhangju ji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 李周望 Li Zhouwang 輯，《國朝歷科題名碑錄初集》*Guochao like timing beilu chuj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Yongzheng keben。
- 俞長城 Yu Changcheng，《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Keyitang yibai ershi mingjia zhiy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戊午(1738)文盛堂懷德堂同重刊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Qianlong wuwu (1738) Wenshengtang Huaidetang tong chongkanben。

- \_\_\_\_\_，〈《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Keyitang yibai ershi mingjia zhiyi*〉，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戊午（1738）文盛堂懷德堂同重刊本 Guoli Taiwan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Qianlong wuwu (1738) Wenshengtang Huaidetang tong chongkanben。
- 孫 岱 Sun Dai，〈《歸震川先生年譜》*Gui Zhenchuan xiansheng nianpu*〉，天津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 Tianjin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wu nian (1879) keben。
- 崑 岡 Kungang 等修，劉啟端 Liu Qiduan 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Qinding Daqing huidian shil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80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清光緒石印本 Qing Guangxu shiyinben。
- 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明史》*Ming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 張朝瑞 Zhang Chaorui，〈《皇明貢舉考》*Huangming gongju kao*，〈《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82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Beijing daxue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keben。
- 陳水雲 Chen Shuiyun、陳曉紅 Chen Xiaohong 校注，〈《梁章鉅科舉文獻二種校注》*Liang Zhangju keju wenxian er zhong jiaozhu*〉，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15。
- 陳際泰 Chen Jitai，〈《太乙山房文集》*Taiyi shanfang wenji*〉，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1633）繡谷李士奇校刊本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Chongzhen liu nian (1633) Xiugu Li Shiqi jiaokanben。
- 湯賓尹 Tang Binyin，〈《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Shui'an Tang Jiabin xiansheng pingxuan like xianghui mojuan*〉，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馮汝宗刊本 Zhongyang yanjiuyuan Fu Sinian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sishi'er nian (1614) Feng Ruzong kanben。
- \_\_\_\_\_，〈《睡庵湯嘉賓先生評選歷科鄉會墨卷》*Shui'an Tang Jiabin xiansheng pingxuan like xianghui mojuan*〉，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坊刻本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mo fangkeben。
- 湯顯祖 Tang Xianzu，〈《湯海若先生制義》*Tang Hairuo xiansheng zhiyi*〉，收入陳名夏 Chen Mingxia 編，〈《國朝大家制義》*Guochao dajia zhiyi* 第 26 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末陳氏石雲居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mo Chenshi Shiyunju keben。

- \_\_\_\_\_, 《湯許二會元制義》 *Tang Xu er huiyuan zhiyi*, 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刻本 Guojia tushuguan cang Ming Wanli jian keben。
- 湯顯祖 Tang Xianzu 著, 徐朔方 Xu Shuofang 箋校, 《湯顯祖全集》 *Tang Xianzu quan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古籍出版社 Beijing guji chubanshe, 1999。
- \_\_\_\_\_, 《湯顯祖集全編》 *Tang Xianzu ji quanbi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6。
-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 Ningboshi Tianyige bowuguan 整理, 《隆慶四年江西鄉試錄》 *Longqing si nian Jiangxi xiangshi lu*,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 *Tianyige cang Mingdai keju lu xuankan, xiangshi lu* 第 29 函第 3 冊, 寧波 Ningbo: 寧波出版社 Ningbo chubanshe, 2010, 天一閣藏明刊本 Tianyige cang Ming kanben。
- 趙吉士 Zhao Jishi, 《寄園寄所寄》 *Jiyuan ji suo ji*, 合肥 Hefei: 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 2008。
- 趙爾巽 Zhao Erxun, 《清史稿》 *Qingshi g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7。
- 劉熙載 Liu Xizai, 《藝概》 *Yiga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78。
- 蔡 沈 Cai Chen 撰, 王豐先 Wang Fengxian 點校, 《書集傳》 *Shu jizhu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8。
- 談 遷 Tan Qian, 《國榷》 *Guoque*, 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 Guojia tushuguan cang jiu chaoben。
- 鄭 玄 Zheng Xuan 注, 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 黃侃 Huang Kan 句讀, 《禮記正義》 *Liji zhengyi*, 《十三經注疏》 *Shisanjing zhushu* 第 6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0。
- 鄭 玄 Zheng Xuan 注, 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 黃侃 Huang Kan 句讀, 《周禮注疏》 *Zhouli zhushu*, 《十三經注疏》 *Shisanjing zhushu* 第 4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0。
- 羅萬藻 Luo Wanzao, 《此觀堂集》 *Ciguantang ji*,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192 冊, 臺南 Tainan: 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 1997,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跃齋刻本 Liaoningsheng tushuguan cang Qing Qianlong ershiyi nian (1756) Yuezhai keben。
- 顧炎武 Gu Yanwu 撰, 黃汝成 Huang Rucheng 集釋, 樂保群 Luan Baoqun 校點, 《日知錄集釋》 *Rizhilu ji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20。
- 龔延明 Gong Yanming 主編, 毛曉陽 Mao Xiaoyang 點校, 《萬曆十一年進士登科錄》 *Wanli shiyi nian jinshi dengke lu*,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

*Tianyige cang Mingdai keju lu xuankan, dengke lu* 下冊，寧波 Ningbo：寧波出版社 Ningbo chubanshe，2016。

## 二、近人論著

- 孔慶茂 Kong Qingmao，〈《八股文史》*Baguwen shi*〉，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8。
- 王小巖 Wang Xiaoyan，〈論湯顯祖的制藝〉“Lun Tang Xianzu de zhiyi”，《人文論叢》*Renwen luncong*，2，武漢 Wuhan：2015，頁 185-199。
- 王玉超 Wang Yuchao，〈湯顯祖的制義文寫作與早年文學追求〉“Tang Xianzu de zhiyiwen xiezuo yu zaonian wenxue zhuiqiu”，《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6，北京 Beijing：2018，頁 202-210。
- 何朝暉 He Zhaohui，〈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Wan Ming shiren yu shangye chub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9。
- 汪群紅 Wang Qunhong、宋志強 Song Zhiqiang，〈俞長城制義理論述評〉“Yu Changcheng zhiyi lilun shuping”，《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i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50.5，南昌 Nanchang：2017，頁 115-123。
- 沈俊平 Sim Chuin Peng，〈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Ming zhongwanqi fangke zhiju yongshu de chuban ji chaoye renshi de fanying”，《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27.1，臺北 Taipei：2009，頁 141-176。doi: 10.6770/CS.200903.0141
- \_\_\_\_\_，〈《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Juye jinliang: Ming zhongye yihou fangke zhiju yongshu de shengchan yu liutong*〉，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09。
- 金文京 Kim Moon Kyung，〈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Tang Binyin yu wan Ming shangye chuban”，收入胡曉真 Hu Siao-chen 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Shibian yu weixin: wan Ming yu wan Qing de wenxue yish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choubeichu，2001，頁 79-100。
- 姚越超 Yao Yuechao，〈論八股文對湯顯祖戲曲創作的影響〉“Lun baguwen dui Tang Xianzu xiqu chuanguo de yingxiang”，《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Xinan nongye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3，重慶 Chongqing：2014，頁 95-98。
- 胡梓穎 Tsz Wing Giovanna Wu，〈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湯顯祖嘉隆時期應試制藝研究〉“Neng yu bimo zhiwai yan suo yu yan zhe: Tang Xianzu Jia Long shiqi

- yingshi zhiyi yanjiu”，收入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 Fuzhou Tang Xianzu guoji yanjiu zhongxin 編，《湯顯祖學刊》*Tang Xianzu xuekan* 第 8-9 輯，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21，頁 104-129。
- 胡慧錦 Hu Huijin，〈湯顯祖的制藝觀〉“Tang Xianzu de zhiyi guan”，《文藝生活·文海藝苑》*Wenyi shenghuo, wenhai yiyuan*，9，長沙 Changsha：2014，頁 13。
- 徐朔方 Xu Shuofang，《論湯顯祖及其他》*Lun Tang Xianzu ji qita*，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
- 高琦 Gao Qi，〈代言盡意·擇理精淳——論湯顯祖的八股文創作〉“Daiyan jinyi, zeli jingchun: lun Tang Xianzu de baguwen chuanguo”，收入徐國華 Xu Guohua 主編，《湯顯祖研究集刊——紀念湯顯祖逝世 400 周年專號》*Tang Xianzu yanjiu jikan: jinian Tang Xianzu shishi 400 zhounian zhuanhao*，北京 Beijing：中國戲劇出版社 Zhongguo xiju chubanshe，2016，頁 41-53。
- 商衍鑾 Shang Yanliu，《清代科舉考試述錄》*Qingdai keju kaoshi shulu*，北京 Beijing：故宮出版社 Gugong chubanshe，2014。
- 郭孟良 Guo Mengliang，《晚明商業出版》*Wan Ming shangye chuban*，北京 Beijing：中國書籍出版社 Zhongguo shuji chubanshe，2011。
- 陳水雲 Chen Shuiyun、黎曉蓮 Li Xiaolian，〈陳名夏的八股文批評述略〉“Chen Mingxia de baguwen piping shulue”，《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63.1，武漢 Wuhan：2010，頁 97-103。
- 曾肖 Zeng Xiao，《復社與文學研究》*Fushe yu wenxue yanji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18。
- 馮家紅 Feng Jiahong，《耕讀為本：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藏品圖錄》*Gengdu wei ben: Nanjing Zhongguo keju bowuguan cangpin tulu*，合肥 Hefei：安徽美圖出版社 Anhui meitu chubanshe，2018。
- 鄒元江 Zou Yuanjiang，《湯顯祖新論》*Tang Xianzu xinlun*，臺北 Taipei：國家出版社 Guojia chubanshe，2005。
- 蒲彥光 Pu Yen-kuang，《明清經義文體探析》*Ming Qing jingyi wenti tanxi*，臺北 Taipei：花木蘭文化 Huamulan wenhua，2010。
- \_\_\_\_\_，〈守經、用經與背經——試論明代經義文如何解經〉“Shoujing, yongjing yu beijing: shi lun Mingdai jingyiwen ruhe jiejing”，《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34，臺中 Taichung：2013，頁 43-68。
- 鄧俊 Deng Jun、高琦 Gao Qi，〈少年顯奇才，佳構驚考官——初論湯顯祖早期八股文《女有餘布》〉“Shaonian xian qicai, jiagou jing kaoguan: chu lun Tang Xianzu zaoqi baguwen ‘Nü you yubu’”，《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Donghua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31.2, 撫州 Fuzhou: 2012, 頁 105-108。
- 鄭邦鎮 Zheng Bang-zhen, 《明代前期八股文形構研究》*Mingdai qianqi baguwen xinggou yanjiu*,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 1987。
- 謝國楨 Xie Guozhen,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Ming Qing zhi ji dangshe yundong k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2。
- 魏 青 Wei Qing, 〈湯顯祖和八股文〉“Tang Xianzu he baguwen”, 《溫州師範學院學報》*Wen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1, 溫州 Wenzhou: 2001, 頁 32-35。
- 蘭德生 Lin Desheng、趙萍 Zhao Ping, 《八股風光五百年》*Bagu fengguang wubainian*, 北京 Beijing: 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 2011。
- 饒 芳 Rao Fang、劉昌衍 Liu Changyan, 〈湯顯祖科考試卷佚存略考〉“Tang Xianzu kekao shijuan yicun luekao”, 收入撫州湯顯祖國際研究中心 Fuzhou Tang Xianzu guoji yanjiu zhongxin 編, 《湯顯祖學刊》*Tang Xianzu xuekan* 第 8-9 輯,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21, 頁 175-179。
- 龔重謨 Gong Chongmo, 《湯顯祖研究與輯佚》*Tang Xianzu yanjiu yu jiyi*, 海口 Haikou: 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 2009。
- \_\_\_\_\_, 《湯顯祖大傳》*Tang Xianzu dazh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5。
- 龔篤清 Gong Duqing, 《明代八股文史探》*Mingdai baguwen shi tan*, 長沙 Changsha: 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 renmin chubanshe, 2005。
- \_\_\_\_\_, 《中國八股文史·明代卷》*Zhongguo baguwen shi, Mingdai juan*, 長沙 Changsha: 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 2017。
- 龔篤清 Gong Duqing 等編著, 《八股文話》*Baguwen hua*, 長沙 Changsha: 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 2020。
- 鶴成久章 Tsurunari Hisaaki, 《明代八股文学史資料の整理と研究》*Mindai hakko bungakushi shiryō no seiri to kenkyū*, 東京 Tokyo: 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 Monbu kagakushō kagaku kenkyūhi hojokin kenkyū seika hōkokusho, 2007。
- Des Forges, Alexander. “Industry and Its Motivations: Reading Tang Xianzu’s Examinatio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Excess Clot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0.1, 2020, pp. 85-122. doi: 10.1353/jas.2020.0004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Guy, R. Kent. "Fang Pao and the *Ch'in-ting Ssu-shu-wen*,"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50-182.
-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Sun Chang, Kang-i and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 From 13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i: 10.1017/CHOL9780521855594
- Williams, John. "Identity Verification as a Standard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Martin Hofmann et al. (eds.), *Powerful Arguments: Standards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20, pp. 349-392. doi: 10.1163/9789004423626\_010

## The Concluding Paragraph of the *Zhiyi*: A Study of Tang Xianzu's Examination Essays for the 1583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Tsz Wing Giovanna W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twwu@eduhk.hk

###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generally held that among the three examination essays written by Tang Xianzu 湯顯祖 (1550-1616) in 1583, two of them had long been lost. In the absence of these examination essays, some scholars, based on their impression of Tang's *zhiyi* 制藝 (commonly known as “eight-legged essay”) writing style, think that Tang's repeated failures at the exams were tied to the fact that his views on the eight-legged essay were contrary to orthodoxy. In this article, I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whereabouts of Tang's three examination essays by examining numerous anthologies of eight-legged essays print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compar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his examination essay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writings collected in anthologie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not identical. In order to correspond to the writing norms of the Qing dynasty, Qing compilers often shortened the “great conclusion” in the original texts. The abridgment in the concluding paragraphs of Tang's examination essays not only weakens the structural beauty of his essays, but also conceals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found in the original texts. The rediscovery of Tang's examination essays with their concluding paragraphs reveals that his eight-legged essays not only meet the examination specifications in their content and form, but also that they incorporate lyricism and irony.

**Key words:** Tang Xianzu 湯顯祖,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formulated exegesis, concluding paragraphs, the Wanli 萬曆 period

(收稿日期：2023. 4. 10；修正稿日期：2023. 8. 1；通過刊登日期：2023. 9. 25)